

功德园 人物40 陶德琨

编者按:在雨花台功德园,长眠着很多科学家、艺术家、老革命家和各领域的专家,他们的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;天文、土壤、古生物、化工、物理、水利、航天、音乐、绘画……他们工作的领域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陌生。但就是这样一群人,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人物”,为您介绍这些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。



陶德琨(1882—1970):字仲涵,号百扇居士。湖北襄阳人。1902年,陶德琨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,1903年3月赴美留学。1904年寒假,旅居纽约时,结识孙中山,深受启发和影响,次年加入同盟会。1910年学成回国,担任湖北“督、抚、司、道会议厅”的审查员兼藩署财政顾问官,后任汉口高等商业学堂教务长。武昌起义胜利后,陶德琨任军政府理财副部长兼湖北造币厂总理,后接任理财部长。1912年1月,陶德琨前往南京,随侍孙中山,并以经济学家身份任财政部参事。国民政府迁都北京后,陶德琨历任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专任委员、印花税总发行所金事等职,负责研究和筹办币制改革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上书建议改革币制,被誉为“人民币改革第一人”。1970年3月5日病逝于南京。

陶德琨：“袁大头”设计者、人民币改革第一人

陶耀乐先生是陶德琨的孙子,虽然曾经与祖父一起生活过多年,但关于祖父的传奇经历,他也只是略知一二。几年前,陶耀乐和家人计划出版一本家族史,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,机缘巧合,湖北襄阳的族人正好找到了他们。与老家的人多番交谈,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再加上自己的记忆,陶耀乐渐渐勾画出祖父的完整形象——他是孙中山和黄兴的好友,他是怀揣救国梦的官费留美生,他是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财政部长,受托组织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,他是“袁大头”的设计者,他是上书毛泽东的“人民币改革第一人”,他属于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……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本版图片由陶耀乐先生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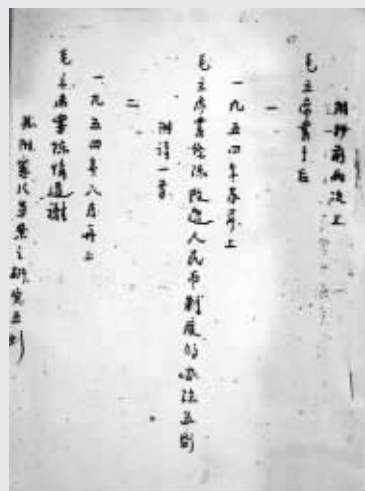
1913年的陶德琨



1954年,陶德琨(中坐者)与家人在南京合影



1954年,根据陶德琨建议,人民币采用小面额。图为第三版人民币中的部分票面



陶德琨上书毛泽东提议改革人民币的手稿

留学美国期间结识孙中山,参加同盟会

陶德琨1882年出生于湖北襄阳,他自幼聪慧,善诗文。十四岁那年,陶德琨应襄阳府考试,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。此后,经湖北学政王同愈选拔,他进入武昌经心书院学习。当时,正值张之洞主政湖北,全力推行“时务”课,学校一扫传统陈腐的教学方式,还订阅了《新民丛报》等进步刊物,学生们关注时政、聚谈国是,探索、研究救国方略,一时蔚然成风。

1902年,陶德琨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。1903年春,陶德琨赴美留学,途经日本横滨时,受到中

国留学生黄兴、李书城、刘成禹等人的欢迎。

初到美国时,陶德琨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怀俄明中学,专门学习语言。1904年寒假,陶德琨前往纽约,在临时寓所,他结识了同住在此的一位中国人。经过交谈,陶德琨得知,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。相同的人生观和振兴中国的共同理想,使得两人深觉相见恨晚,从此成为好友。此后,他频繁和德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瑞士、日本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书信往来,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,并于1905年加入同

盟会。

语言学习结束后,陶德琨按照张之洞之前的建议,先后进入俄亥俄大学经济系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,主攻财政、财经、货币学,并获得硕士学位。

陶德琨在美留学期间,节衣缩食,从日常开销中省下数千元,购买了最新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,以及政治学、经济学、银行货币学、财政学等国内稀缺的书籍数百册。

毕业之后,他又自费周游欧美各国,考察财经、币制、金融制度,以期学有所成。

受托组织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

1910年11月,陶德琨从意大利回到上海。他先是前往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,随后,启程前往武汉。

当时,清政府在全省筹备咨议局,要求湖北选两名“议绅”作为省级最高代表,参议国是。陶德琨被选为“议绅”,担任“督、抚、司、道会议厅”的审查员兼藩署财政顾问官,后又担任汉口高等商业学堂教务长。担任顾问官期间,陶德琨住在配给的一栋花园洋房里。在这栋花园洋房里,陶德琨也在秘密履行同盟会

交给他的任务:联络武汉的各会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。当时在武汉最大的两个组织,一个是共进会,一个文学社。共进会成员大多是日本留学生,文学社大多由下级士兵中各帮会的人集合而成。两个组织之间,矛盾较大,陶德琨着力进行调节。辛亥革命前夕,两个组织达成合作意向,并明确分工。

武昌起义后,陶德琨参加筹建湖北军政府,办理外交事宜,后又担任理财部副部长和部长,并兼湖北

造币厂总理。当时,造币厂生产一种十八星旗的铜币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币,都是陶德琨的意见。

在湖北军政府任职期间,陶德琨还和刘公、居正等七人组成约法起草会,以刘公为主席,编出一部《鄂州约法》,这部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。

1912年初,陶德琨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南京,在临时大总统府住了两个多月,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财政部参事。

纵横金融财政,主持币制改革

国民政府迁都北京后,陶德琨历任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专任委员,泉币司科长等职,负责研究和筹办币制改革。后来广为流通的“袁大头”银币就是由陶德琨设计并督造的。“袁大头”的样式、质地、工艺,在当时发行的钱币中,都属上乘。

陶德琨还做过国务总理顾维钧的机要秘书。他在京任职时,常应邀为北京各大学讲授财政经济、币制学等课程。在此期间,他撰写了《中

国币制问题治标策》《设立上海造币厂计划书》等论著,先后在《财政月刊》和《上海银行月刊》上发表过许多关于财政和币制的论文,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陶德琨先是担任财政部币制局名誉顾问,后又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。1930年,宋子文主政国民政府实业部期间,陶德琨受聘担任实业部专门委员。随后,又受孔祥熙邀请,担

任财政部货币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。陶德琨曾撰文倡行新币制,并参与办理法币政策的实施。

1930年到1936年间,陶德琨曾先后在东北创办边殖民银行和大华银行,并被推为董事长。1939年8月,陶德琨被聘为货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,对于战时财政的支持,贡献巨大。

1941年,陶德琨复任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,直至1949年。

“襄阳事件”震惊陶德琨,他坚决留在了大陆

陶德琨担任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期间,亲历了国民政府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崩溃过程。当时,由于连年的抗战与内战,国民政府财源日益枯竭。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,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,并且纸币的面值越来越大,最高的竟然达到60亿元,最小的

也面值100元。虽然是100元的面额,但实际购买能力非常低,以至于出现了扛着一麻袋钱去买米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

在此期间,陶德琨的老家襄阳发生了一件事情:一家布店的小老板,在出售布匹时,因为嫌麻烦,拒收100元的纸币。这件事情被国民党特务加以利用,以干扰政府货币流通为由,将布店老板和学徒枪杀。这件事情震惊了陶德琨,使得他对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心灰意冷。

1949年4月,南京解放,陶德琨主动协助新政府办理财政部的清理转移工作。几个月后,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到南京,邀请陶德琨北上。67岁的陶德琨谢绝了好友的邀请,继续留在了南京。



由于法币贬值,工人发工资时领到成捆甚至成箱的钱币

上书毛泽东,共商币制改革大计

解放初期,人民币沿袭过去的币制,面额、版别十分混乱,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。陶德琨经过仔细观察论证后,认为人民币改革势在必行。他根据自己多年在货币研究和管理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,结合扎实的专业知识,撰写成《改进人民币制度的办法五则》,并于1954年上书毛泽东,建议将老人民币改为新人民币。

毛泽东看到陶德琨撰写的《改进人民币制度的办法五则》和他设计的草样后,给予了高度的肯定,当即表示采纳他的建议。陶德琨建议,人民币采用小面额,共有1分、2分、5分、1角、2角、5角、1元、2元、3元、5元十种。

第二版人民币在设计、印刷时,得到了周恩来、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,他们亲自审查

了整个设计方案。定型后的票面式样打破了旧有四边框形式,采用了左右对称的新样式,图案精密美观、色彩鲜明活泼。

新人民币的设计完成后,经毛泽东批准,奖励陶德琨300万元(是旧人民币,大约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)。而陶德琨也因此被誉为“人民币改革第一人”。

1955年11月,陶德琨又撰写长达万言的《有关新币制国际前途应注意个点的意见》,并呈毛泽东审阅。在古稀之年,他为自己仍能学有所用,仍能为新政权和人民服务而感到由衷的欣慰。

1955年,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版人民币正式发行。1957年,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10元面额人民币,3元面额逐渐退出流通。1999年,第二套人民币停止流通。